

# “以城市托举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与使命” 学术笔谈

吴志强 汪光焘 杨保军 郑德高 王 兰 袁 媛 杨晓春 彭 翀 陈 晨 杨天人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城市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核心空间载体，其发展模式与国家现代化战略深度交织。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特征，我国城市发展必须突破传统路径依赖，探索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现代化范式。如何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托举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文明转型，实现“点状现代化”向“全域现代化”的跃迁，成为亟待探讨的学术命题。为此，本刊编辑部组织新一期学术笔谈“以城市托举中国式现代化：意义、路径与新使命”，旨在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语境，解析城市转型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深层关联，探讨如何通过高质量的城市规划托举国家现代化目标。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志码：C

DOI: 10.16361/j.upf.202503001

文章编号：1000-3363(2025)03-0001-08

## 中国式现代化中城市的历史角色与使命

吴志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当前，我们国家本历史阶段的总体发展目标是把一个古老而辉煌的文明提升为一个伟大繁荣富强的现代文明国家。

城市在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文明形成与演化的高地角色。它既是文明的起源点之一，又通过辐射与联动，带动更广阔区域的社会发展与文化整合。也就是说，城市不仅以点状的形态激活广袤空间中的多元交融，更在不同时期承载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跃迁，成为新一轮历史高峰的发端。在西方语境中，这种以城市为核心推动整体文明演进的模式常被概括为“civilization”过程的具象体现。城市带动整体。纵观中华文明的五千多年，三个特点可以得到印证：①不同地理方位上多元文明起点的并存与并发；②贯穿历史的整体性交往与融合趋势；③各文明发源点在吸纳外来要素基础上的持续创新与再造。

进入现代国家构建进程中，城市依然在中华民族整体现代化中承担着关键功能。从文明演进角度出发，城市的主要作用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城市应成为现代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在当代社会文化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第二，城市需要具备对外来现代文明要素的吸纳与整合能力，通过跨地域的学习与接收，为自身现代化注入新动能；第三，借助各城市点状辐射与网络联动，推动全国层面的现代化协同提升，形塑出一

个多元圈层、互联共进的现代文明格局；第四，在集成多种要素的基础上，城市将成为国家新一轮制度、文化与社会基因的孕育地，并通过不断迭代与演进，助力中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深度转型。

可以说，城市在本质上肩负着托举民族整体迈向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自近代以来，这一使命已逐步明确，但当前仍未完全达成。秉持“以城市来托举国家现代化”的初心，亟须警惕城市建设中“物质化”倾向的泛化，认识到城市不仅是空间与建成环境的集合，更是现代文明孕育与传播的关键节点。唯有将城市建设置于文明传承与现代转化的双重使命之中，方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从古老文明大国向现代文明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以城市为核心，走经济繁荣、文化传承、包容共享、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城乡协同发展的道路，支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汪光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原建设部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作为人口和经济聚集的主要载体，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引擎作用。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以创新驱动发展、夯实国家和居民财富增值的核心力量；城市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城市是各群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家园，让城市变得更

包容,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支撑国家“双碳”目标实现,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面向人工智能和颠覆式创新应用的未来,城市是我们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之基”。

一是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是现代化城市的基础。我国人均GDP虽然突破1.38万美元,但还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1.45万美元/人(世界银行数据)],只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1/3,未来仍有很长的发展道路要走。这就需要继续以转型创新作为城市经济的突破口,努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也要发挥好信息化、物联网等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作用,持续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中国实体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人工智能在各行业领域的快速应用,必然会带来行业迭代的加速,传统就业门类快速衰退、新兴行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但用工规模减少的现象,这就要求城市充分关注就业问题,将就业作为民生之本,织密社会保障网络,加强终身培训学习,提供满足灵活就业和兼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系统。

二是文化传承。城市本身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化不仅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特色和品质的重要标志。要针对各个历史时段进行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做好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活化利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要把中国自古以来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各种营建智慧进行全面的挖掘、梳理与总结,提炼出中国城市建设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精髓,作为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品质发展的基础。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做好文化传承工作,不仅能增强城市居民归属感、自豪感,提升凝聚力和认同感,也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使中华传统城市文明中的优秀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中得到创新性发展。

三是包容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其反映在城市中就是要让各阶层居民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目前城市特别是特大超大城市中,由于住房、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本地户籍和新市民、新青年之间在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异。有学者以深圳、佛山和广州非户籍居民为例的研究成果表明,各城市均有超过300万以上人口无法实现可支付的体面住所,比本地户籍人口分别高出23.6%、22.2%和30.1%。以深圳为例,1007万人口居住的“城中村”,幼儿园、社康中心数量仅为正规建成区的1/3。另外,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的公平共享等方面,城市还有很多的短板需要弥补。持续开展城市更新行动,让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公平共享,让各阶层群体都能够安居乐业。

四是绿色低碳。城市是能源消耗的主体,随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繁荣,工业加工制造业用能耗占比为主将逐步被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耗占比为主取代。按照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要求,2030年将实现碳达峰,对城市的

绿色低碳发展提出很高要求,也是中国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域。这就要求城市要关注低碳交通发展、市政和老旧小区的绿色化改造,绿色低碳技术体系和标准从规划、小区街区到建筑等多尺度的技术集成,以及通过多场景的应用,引导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大规模的产业化体系。

五是智慧高效。信息化已经激发了许多新的应用场景,改变了人民的生活。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快速突破,使信息化可以在城市治理、智慧社区、人车路网协同、风险管理等方面,极大提高效率和科学决策水平。如:强化对城市地下管网、重要危险源的监测和预警,可以使城市在应对风险防控和应急调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的迅速推进,智慧社区和智慧家庭等可以在促进福祉、提高完整社区服务效能方面,发挥突出作用。运用数字化技术,在“城市大脑”智慧管理、科学决策方面的应用场景,也值得持续推进和完善。

#### 城市的作用及未来城市规划的四大新使命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陈鹏(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规划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1. 城市在国家现代化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城市有三大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人们生活的家园、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载体、创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从现代化演进的视角看,城市在国家社会结构演变和社会文明进步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是实现现代化的“火车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其实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系统性变革,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是民主化、法治化,或者科技革命、制度创新等,都是在城市的带动下实现突破和转型的。

可以说,城市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载体与动力引擎。没有城市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城市现代化也赋予了中国特色的要求与内涵。城市是城市化的载体,只有城市吸纳了超过10亿的人口,并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全面转型,一个14亿巨大人口规模的国家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城市是先进生产力的集聚地,只有城市自身经济繁荣并且有效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才能通过区域均衡、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市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中心,只有尊重历史、尊重文化,才能在文化自信的加持下让5000多年中华文明赓续不断,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城市是人地矛盾的焦点,只有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引领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只有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能通过更高水平的国际开放与合作,实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面临很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应对社会、经济、生态等各个领域各种复杂变化的综合韧性能力,

将是未来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2. 新时期城市规划有四大新使命，要应对现代化的复杂要求，规划学科必须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比翼齐飞。

城市规划不是一个规划，而是一个规划体系。根据国家规划体系的要求，城市规划将形成以战略规划为引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为支撑的完整体系。但无论城市规划的体系构成如何变化，规划的内在价值始终不变，那就是“务实求真”：研究真问题、回应真需求、创造真价值、保障真落地。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和时代需求，未来城市规划将至少有四大新使命：一是系统协调，基于城市全生命周期理念，从单一空间治理转向综合系统治理；二是价值创造，适应城市更新时代的需求，从基于空间的资产扩张转向价值创造与权益转化；三是治理赋能，适应城市从建设为重向治理为重的转变，从单一的辅助性技术工具升级为全方位的治理现代化抓手；四是转型引领，充分发挥城市的科技优势，推动全社会的绿色低碳与智慧韧性转型。当前的重点，无疑是推动城市更新、激活发展动力。

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历来是工科为主、理科为辅，这在以前以空间生产为主的大建设时期，当然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但却难以应对现代化的复杂要求。从未来来看，城市规划学科必须插上科技和人文两扇翅膀，互补互促、比翼齐飞。如果说科技改变世界，那么人文就是温暖世界。科技很重要，但科技是价值中性的，对人而言，科技是冷冰冰的。但城市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家园，城市规划要服务于人的物质、精神等各种需求，要使城市真正成为养育人、陶冶人的地方，要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人文关怀，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这就要求规划学科一方面强化技术赋能，比如AI驱动规划范式重构、大数据支撑的精准规划、智能化流程再造等；另一方面强化融合创新，打破理工工商边界构建复合知识体系，通过多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迭代，培养“规划—建设—运营—治理”全链条专业复合人才。最终建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适应更新时代需求、适应国家规划新体系的城市规划综合性学科群知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更具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理论和道路。

###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关键维度与场景重构

**郑德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了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中国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引擎，实现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要围绕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与智慧等五大维度的发展，也涉及城市发展从要素驱动的“增长主义”向创新驱动的“结构主义”转型，基于空间再生产、创新地理学和城市动力学等相关理论，笔者认为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要围绕创新引领的经济繁荣、共同富裕导向的公共服务

供给、绿色低碳导向的自然城市、“文化+”引领的场景应用，以及智慧引领的城市治理等方面展开。

创新引领的经济繁荣，重塑城市的创新链、产业链与供应链。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经济发展尤其人均GDP要达到一定水平，当前我们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预计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2.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49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由于中国已进入“被追赶的经济体”行列，核心是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国内外研究表明，创新并不在所有城市展开，只会有一些“创新塔尖城市”进行，可以判断“创新塔尖城市”会比“全球城市”对城市体系的影响更深远，要研究“创新链、产业链与供应链”（“三链”）对中国城市的功能、布局，以及人口流向产生的重大影响。初步得出的结论是，“三链”在空间上的集聚规律，创新链会在5 km范围内集聚与组织，产业链会以都市圈为单元组织，一般集聚在50 km范围内，而供应链会在120 km范围内的城市群组织。因此塔尖创新城市以及其影响的城市群都市圈都会围绕“三链”有着新一轮的重塑重构。

共同富裕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重塑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中国式城市现代化的第二个关键是共同富裕，这是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的重要体现，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需要关键的空间场景支撑。围绕共同富裕，可以围绕“四好”展开。首先，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其次，每个人的房子可能千差万别，但走出房子能享受到好小区、好社区的公共服务便利，要完善“15分钟社区生活圈”，完善养老、托幼、医疗、公园、商业等功能。最后，好城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上海的“一江一河”建设就是公共空间建设最好的范例，让全体人民能享受到更人文、更活力、更生态的高品质空间。

绿色低碳导向的自然城市，重塑城市与自然的关系。古代中国城市强调“天人合一”和“自然中的城市”。近代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是城市有开放的公园，供全体老百姓使用。面向未来，要进一步突破城市—生态二元结构，城市的发展要更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城市与生态的关系从“城市中的公园”转向“城市即公园”，即核心含义是从碎片化的公园转向无处不在的公园。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公园的面积总量已经不低，关键是质量欠佳，提升关键是围绕生物多样性和满足人的需求两个目标。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要进行生态廊道的连通、小微生境的塑造等。围绕人的需求，要体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等目标。北京“无界公园”、成都“公园城市”等都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此外，城市也要强调低碳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尤其低碳小区、低碳园区的创建越来越能体现城市的低碳雄心。

“文化+”引领的场景应用，重塑城市的文明与新消费空间。城市不仅是人类物质文明的容器，更是精神文明再生产的关键场域。城市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其重要意义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但在具体方法路径上还缺乏更广泛的共识。首先，要尽可能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对“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

让“老城不能再拆了”“留改拆”等政策要严格执行，要保护好人类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寄托。其次，要进一步认识“文化+”在经济社会方面的重要意义，文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人们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空间生产”转向“空间消费”，从为产品买单转向为空间场景买单，从“买一杯咖啡喝”转向到“在哪里喝咖啡”。“文化+”空间场景在城市中会越来越重要，那些“老小区、老厂区、老街区”将在“新旧融合”共生中找到更大价值。我们也看到北京的“首钢园”、上海的“上生新所”都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智慧引领的城市治理将重塑城市的运维机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进步，城市将能更加智慧地发展，一些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尤其是大城市病，将会得到更加智慧的解决方案。一是一些关键智慧领域的应用，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大城市的拥堵有时是缺乏更加智慧的及时应对，未来智慧红绿灯、智慧出行引导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二是从“智慧社区”到“智慧城区”的空间场景应用。随着城市感知系统的广泛应用、“CIM”等智慧平台的建设，城市将与人类一样甚至更加聪明，也能及时发现问题、预警问题、解决问题。

## 以健康为导向的现代化城市观：理念、路径与技术支撑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城市作为现代化的核心空间载体，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社会治理、生态文明与人民福祉的集中承载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城市发展的目标和路径需要深度重构：突破以往单一依赖物质建设和经济增长的现代化观，转而构建以“人民健康”为核心、以数智化为支撑、以公平和谐为目标的新型城市现代化范式。

### 1.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转型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道路。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兼顾公平、生态和社会整体福祉的系统性跃升。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的现代化不仅是“高楼林立、轨道纵横”的物理扩展，也不仅是GDP与能级排名的竞赛，而更应体现为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环境质量的可持续性以及市民福祉的全面提升。特别是“人民健康”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的任务，而必须成为城市规划与治理的基础逻辑和战略支点。

因此，我们主张：以健康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建设应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健康城市不仅是改善城市空间品质的举措，更是将国家战略、公共治理与人民期盼有机融合的关键平台。

### 2. 以“健康城市科学”回应现代化的核心诉求

我们在长期研究与实践中提出并深化了“健康城市科学”的理论框架，将其定义为：以全生命周期、全空间尺度促进人

的身心健康为目标，融合医学、规划、地理等多学科知识，以循证路径构建空间干预机制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这一框架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民性”“公平性”与“系统性”。

在具体技术路径上，我们建立了“四要素三路径”模型，即通过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交通网络和绿色空间等关键规划要素，分别从健康风险控制、健康资源配置和健康行为促进等三个维度进行干预，并提出“诊断—编制—评估”三阶段的技术流程，实现对空间健康效应的动态识别与全周期引导。

特别是在我国多尺度规划体系中，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15分钟生活圈、社区微更新等领域，该模型与流程均可嵌入实施，为城市健康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量化、可评估、可追溯的制度工具。这种以证据支撑决策的做法也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精神与科学理性。

### 3. 健康城市的数智跃迁：以新技术赋能新治理

跨入数智文明新时代，城市发展迎来从“经验导向”走向“智能驱动”的深刻转型。以大数据、机器学习、数字孪生和大语言模型（LLM）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为健康城市的构建提供了全新的工具体系。

这些数智技术不仅提升了对城市健康风险的感知精度（如污染源识别、热岛监测、突发疫情追踪），更使我们能够实现“以健康为目标”的空间设计反向驱动。例如：

- 大数据可支持健康资源配置的精准评估，如老龄人群与养老设施的空间适配；

- AI与空间建模可预测不同规划方案对体力活动、社交交往等健康行为的促进作用；

- 大语言模型可作为知识图谱与设计策略的生成引擎，为城市健康导向规划提供辅助决策；

- 数字孪生城市平台可实时模拟空间政策对健康指标的动态影响，实现“边治理、边验证”。

这些前沿技术与健康城市理念的结合，不仅提升了城市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也为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 4. 推动“以健康为核心”的制度系统升级

城市现代化不仅关乎理念与技术，更取决于制度体系与人才机制的配套。我们提出“以规划为主干、健康为导向”的产学研协同模式，在教育、研究与实践等三个方面同时发力，构建可持续的现代化城市健康支撑系统。

在人才培养方面，应推动跨学科交叉课程建设，探索城乡规划与医学、地理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之间的协同育人机制。例如在同济大学，我们已开设“健康城市科学”课程，开展多学科联合教学，并尝试设立双学位项目，推动健康导向规划理念向学生深植。

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加快多要素多时空健康效应模型的研发，尤其是融入时间维度的“演进模拟”，以揭示空间要素与健康结果之间更复杂的因果链条，为健康导向规划提供坚实证据。

在实践层面，应设立城市健康治理试验区，将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联动推动，在城市更新、生态修复、公共服务设施配

置等领域开展“以健康为目标函数”的全周期规划试验，并将其纳入国家城乡发展质量评估体系中。

#### 5. 结语：以“健康城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共同富裕、生态文明、与社会和谐。城市的空间组织、政策引导与公共服务体系构成了实现人民福祉与社会公平的基本场所，因而建设“健康城市”能够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切入点与着力点。“健康城市”的理念，既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体现了新时代城市治理理念的进化与跃迁。

未来，我们应继续推动城市从物质导向走向健康导向，从静态形态建设转向动态福祉营造，从局部优化迈向系统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之基、构建人民之城。

###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人民城市规划与建设

袁媛（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佩瑾（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城市高质量发展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理念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引领。精准识别城市转型需求与挑战，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 1.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转型需求

城市发展亟须向高质量转型。中国城市建设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与品质提升转型。2024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提出从建筑、小区、社区、街区等城市不同尺度推进精细化设计与更新，强调以高质量的城市设计引导空间优化。

城市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回应多元群体的不同需求。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推动城市由规模扩张转向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空间资源公平化的提升。如何实现人群细分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响应，构建全龄友好、性别友好、包容性更强的宜居宜业城市环境，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下城市转型的又一核心要求。

#### 2. 面向多元群体需求的人民城市规划与建设挑战

老年群体：适老性体系缺位，空间支持不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1亿人，占比22%。现有城市空间长期以劳动人口为尺度，适老化设施、康养空间和无障碍系统布局滞后，社区层面的照护资源与社交空间配置不足，难以支撑老年人多层次的健康、情感与参与需求。

儿童群体：成长环境滞后，空间供给断层。儿童对安全性、趣味性、与社交互动高度依赖，但是传统城市规划标准缺乏年龄分层的活动空间、游戏网络与儿童参与机制，社区空间在生理照护与心理成长支持方面存在明显空白，难以满足儿童全面发展的空间条件。

女性群体：性别盲视普遍，空间响应滞后。多数城市空间仍以“性别中立”为规划设计的底层逻辑，忽视女性在日常出行、休憩、抚育等活动中的特定需求，表现为城市安全性不佳、

空间私密性弱、女性公厕空间狭小、育婴设施缺乏或设置不便等。女性对安全、美感与功能复合性的感知更为敏感，现有城市规划设计与建设体系缺乏对性别差异的系统响应。

青年群体：发展空间匮乏，空间归属感缺失。青年作为城市活力主体，却在住房、就业与社交空间上面临系统性短缺。在高流动性背景下，青年在城市中常处于“空间边缘化”状态，缺乏满足其发展需求的弹性空间与文化承载空间，导致大部分城市对青年的吸引力与融合性不足，青年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弱化。

低收入群体：居住保障弱，空间机会不均等。202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4，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低收入人群被排斥于优质空间资源之外，面临住房选址边缘、交通与医疗可达性差等问题。规划建设在服务供给、就业可达与居住稳定性方面有待提升，结构性“空间贫困”问题开始显现。

#### 3. 人民城市建设中分众关怀的可持续规划路径

城市规划需从制度、空间与技术层面作出系统回应，推动城市包容、韧性与可持续发展。

注重制度公平与社会包容，构建可持续的社会空间关系。城市规划应从空间的资源“增量配置”转向“公平再分配”，完善以居住权保障为核心的住房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模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与租购并举住房体系建设，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社会空间格局。

优化空间结构与场景营造，回应人群差异化需求。城市注重多元复合、全龄共享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场景营造。通过微更新、街区治理与全龄友好理念推动空间适应性重构，提升人群对城市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化数字化感知与技术赋能，提升规划响应效率。借助大数据、感知设备与行为实验等技术手段，精准识别不同人群在空间使用中的差异偏好，推动规划设计从“经验导向”向“数据驱动”转型，将儿童、女性、老年人、低收入等群体的实际感知纳入规划决策，提升空间设计的适配性与精准度，为建设人民城市提供技术支撑。

### 以城市托举中国式现代化：安全韧性理念下的城市规划焕新

杨晓春（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 1.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面临的安全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然而，近年来，城市在享受城市化红利的同时，其运行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在不断上升。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人口的高度密集以及经济活动的高度集中，使得城市在面对各种风险时变得更加敏感。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如暴雨、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发的次生灾害，对城市的运行和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2020年新冠疫情的肆虐，更是凸显了城市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脆弱性。这些灾害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对城市居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充分暴露出当前城市安全保障体系的不足。

## 2. 以安全韧性理念推动城市规划设计升维

在面对这些复杂问题时，安全韧性理念为城市规划学科带来了新的思路方向。安全韧性城市规划不是简单的防灾减灾专项规划，而是一种整体升维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思路。它强调从传统的以工程防御为主的风险应对模式，转向以提升城市系统整体适应性和抗逆能力为核心的韧性思维。这种理念要求我们在规划过程中，充分考虑城市与风险共存的现实，识别多样且极端的风险源，明确其空间分布，并对相应的空间与治理需求作出科学研判，从而保证城市在受到风险冲击时具有更高的耐受力，并在风险减退后具有更快的恢复力。

安全韧性城市规划需要构建一个涵盖多风险、多系统、全过程和全域的理论框架。在高度城市化的数智时代，它秉承“因险制宜、形数共构”的指导思想，遵循“以风险判定灾需求、以要素析承灾特性、以安全推韧性策略”的规划分析思路，将“适度承压、迅速复能”作为设定空间系统规划目标和治理能力标准的基本原则，通过精准适配的方法体系与以数赋形的技术体系，不断优化规划方法，从而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理论架构。

## 3. 基于安全韧性理念的城市规划设计焕新

### 3.1 技术方法的数智化创新

在技术方法层面，城市规划学科需要紧跟时代步伐，积极引入信息化、智慧化技术手段。一方面，要构建数据收集、指标构建、模型模拟及应急管理规划工具的智慧集成平台，助力实现城市安全风险感知精细化、规划设计智能化、规划管理平台化。通过大数据、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技术，对城市关键风险地段和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监测，构建风险特征识别与评估模型，实现对城市风险的快速感知与精准识别。另一方面，要研发城市灾害情景模拟、灾害影响预测与多模态的空间资源配置技术，自动生成多套安全韧性城市规划方案，为决策者提供全面而具体的选择依据。

### 3.2 规划内容的精细化拓展

在规划内容方面，需要深刻解析不同地域、不同尺度和不同规模情况下城市所面临的现实需求和关键挑战，统筹长期与远期、刚性与弹性、上位要求与下位诉求的关系，将韧性策略融入前期分析、空间策略、规划方案、实施措施的规划全过程。首先，不同地域的不同灾害风险分区的现实需求大相径庭，其次，不同空间尺度的安全韧性规划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各有侧重，如区域尺度的关键挑战在于跨越行政边界的网络协同韧性、城市尺度在于内部空间的系统韧性、社区尺度则是特征建筑群和关键设施的性能韧性。因此，在前期分析阶段，要通过整合多源数据，运用多元计量方法，实现对城市安全韧性特征的科学刻画，精准研判与城市自然与社会特征关联的关键风险和关键地段，为规划决策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与数据依据；在规划策略阶段，要基于精准风险分区和时空行为特征的综合研判，明确城市在安全韧性建设方面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应对方针；在规划方案阶段，要聚焦风险特征和灾害链，综合考量城市社会经济、自然生态和治理水平的基础能力和运行规律，对未来

基于不同目标导向和外部政策环境的发展情景进行模拟，优选出社会、经济与环境平衡的比较方案进入情景库；在规划实施阶段，要运用智慧化技术算法，形成可动态响应不同情景模式的政策工具，既能指导相对平稳的常态发展，亦可应对突发扰动时的空间反馈。

### 3.3 政策体系的适应性完善

在政策体系方面，需要建立健全基于广泛参与的全周期管控机制。一方面，要确立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和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合力。另一方面，要健全相关韧性建设政策与法律法规，完善与修正重要韧性城市建设标准规范，建立适应不同地域和类型城市实际需求的层次丰富的规划设计技术指南。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刚弹性结合，构建健全的法治体系，为城市安全韧性建设提供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同时，要持续更新和修订各类标准规范和技术指南，以适应城市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挑战。

## 以城市托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规划的新使命探讨

### 彭群（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和现代社会的核心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实现城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托举作用，需要系统谋划科学的规划路径。在快速城镇化时代，城市规划领域已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分析和空间规划布局的理论与方法。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城市规划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 1. 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发展规划

当今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对城市的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都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在科技创新背景下，针对特定城市和区域，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资金链“多链耦合”分析及产业升级与人口集聚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是前提，这决定了城市未来的人口劳动力特征与经济产业结构模式。其次，要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和产业的空间需求变化。从城市体系视角看，未来的城乡关系、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值得研究；从城市内部看，需要具体探讨城市资源配置、政策支持与产业发展的协同路径，如产业用地的规模与布局结构、交通等基础设施布局优化方向、创新生态营造的空间模式等。最后，探索构建空间适配机制，在此过程中兼顾经济与环境效应的协调，形成适应城市特色发展的布局优化方案。

### 2.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更新规划

城市更新是规划服务城镇化新阶段的重点工作。第一是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健全多元投融资方式，如城市开发建设方式、城市结构优化及其周期管理、政策法规配套等。第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规划要防范应对城市运行中的气候灾害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多重挑战，全面提升城市韧性。第三是住房与社区建设，如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和“三旧”更新改造等。第四是城市功能完善与设

施建设改造，如建立健全多层次、全覆盖的公共服务网络，积极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开展适老化、适儿化改造，科学布局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第五是修复城市生态系统和传承历史文化，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化推进，建设连续完整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开展城市文化遗产资源调查，加强管理与保护，探索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方式路径。

### 3. 探索碳基硅基共创的智慧城市规划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智慧城市规划面临更大的复杂性挑战。一是空间复杂性，即如何认识城市空间。技术进步支撑了城市物质空间走向“低空—地表—地下”的立体化空间系统，这使未来的规划面临更复杂的开发保护任务。二是时间复杂性，即如何认识碳基硅基共创城市的演进规律。吴志强院士在《社会智能关于HAI主义的破题》中指出，随着ChatGPT等先进AI工具的崛起，世界正式踏入了智能文明的新纪元，“HAI主义”应运而生，共同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繁荣与和谐的智慧世界。可见，探讨碳基（人）与硅基（AI）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揭示其如何重塑城市的机制与预测城市的发展趋势是开展规划的前提。三是主体复杂性，人类如何与AI共同开展智慧城市规划。彭仲仁教授在《未来城市谁主笔？》中提出，城市规划的智能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智能化。那么，规划师需要研究如何定义价值导向，引领AI在多类规划编制、管理与监督任务中辅助或自主开展工作，并综合其他主体（如企业、公众）的参与，形成高效高质量规划成果。

最后，作为一名规划教育与科研工作者，笔者认为，规划是一门面向未来的应用学科，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城市发展建设意义重大，学科与专业需要加速焕新以引领实践。第一，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城市巨系统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关系，融入大量跨学科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创新，服务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战略与空间布局优化。第二，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存量时代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与重点任务。不同于快速城镇化时期规划学科聚焦增长范式下的空间规划与设计，当前需要研究存量时代以人为本的空间更新理论与方法，以支撑城市建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与城市更新的规划设计。第三，我们需要深度转化与运用前沿信息技术，推动规划的科学化智能化发展及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建设。在人才培养中，近年来，规划专业呈现多出口特征。未来在培养模式上，可通过“通专结合”“精细化培养”“一生一策”等方式实现人才多出口输出，在培养路径上可探索“微专业”“本研贯通”“书院制”等实施经验。

## 以高质量的城镇化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 陈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聘教授）

城市作为人口、产业、资本、技术、信息等发展要素高度集聚的空间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既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承载和服务庞大人口的主要空间，更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平台。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空间载体、人口结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核心特征，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升至2024年67.0%，数亿人口在城市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人口是城镇化的基石，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土地、投资、空间增长等均为人口城镇化带来的系统性连锁反应。但也应看到，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速已放缓至0.8%左右，快速城镇化进程已出现拐点，正提前迈入诺瑟姆描述的城镇化三阶段中的“城镇化后期”，并呈现出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3点：

一是在全国人口类型转变的背景下，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体力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十年间减少4000万人，体力劳动者减少推动城市竞争转向智力劳动者，人力资本成为发展新动力。

二是在家庭决策理性下，流入地城市地区不承担公共服务、不提供可负担住房的低成本城镇化方式难以为继。新时期的人口流动愈加呈现家庭化、本地化趋势，但县域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而高等级城市因优质公共服务更易吸引高素质人才。

三是广大乡村地区仍未摆脱老龄化和空心化的困境，依赖小农和家庭农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日益艰难。尤其是中西部农村老龄化严重，农业生产依赖高龄老人；东部乡村依赖工业或旅游资源维持活力；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务农意愿与技能，加剧乡村衰退。

已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在“城镇化后期”的主要经验做法包括：一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例如：德国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美国通过优质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直接吸引全球高学历人才。二是为城市的外来移民提供支持性的居住保障，例如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为中低收入群体广泛提供公共住房。三是推进城镇化红利反哺乡村。一方面顺应城镇化后期乡村地域的多功能演化态势，另一方面为逆城市化发展态势下的“新农人”回归乡村扫除制度障碍。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有三点：

一是应看到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客观趋势，认清鼓励性生育政策的局限性，推动“劳务驱动型城镇化”向“知识驱动型城镇化”转型。随着低成本工业化、土地财政等传统驱动力的式微，知识创新、数智文明、高品质消费、绿色可持续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浪潮的主要特征。应摆脱依靠资源能源、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务驱动型城镇化道路，走上理性与创新知识驱动型城镇化道路。城市规划从被动满足产业扩张的空间需求转向主动塑造吸引人才、激发创新、支撑高附加值产业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二是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阶段的居住正义，推动结构主义的“二元城镇化”向人本主义的“人的城镇化”转型。随着我国核心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制度性身份获取门槛的降低与市场化产权获取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日益庞大的新市民群体面临落户意愿与住房支付能力之间的落差。城市

规划需研究如何通过分类施策的住房供给和精准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实现个体流动与城市发展相契合的资源配置,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三是顺应城镇化高级阶段的城乡融合与乡村多功能演化规律,为大城市和城市群地区的人才、资本、技术下乡提供制度保障,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要素下乡不但是对乡村要素流失的经济反哺,更是复兴乡土社会、重塑乡村治理的文化反哺。较高的人才需求和较大的乡村发展潜力让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成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和主力军,但同时也对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城市空间的战略跃迁: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数智赋能与系统治理

杨天人(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副研究员)

#### 1. 城市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空间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经济规模的跃升,更关乎人口结构、创新能力、社会公平与生态安全的系统重构。相较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城市作为人口与要素最密集的空间节点,其治理能力、创新生态与空间包容性已成为现代化跃迁的关键变量。随着人口流动、产业重构、新旧城区的耦合演化,城市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活跃、最复杂,也最具战略主动性的空间平台。

所谓“城市空间的战略跃迁”,指的是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从单一经济功能向复合治理平台转变,从被动承载向主动引领转变,从静态规划向动态统筹转变。这不仅要求对有限空间资源进行高效整合,更要求在制度、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层面引发深度变革。城市空间优化供给、公共服务均衡布局、生态韧性保障正逐步构筑起现代化的空间底座。城市正从“增长的容器”转变为“系统治理的主场”,成为国家战略落地、社会进步推进的主引擎。

#### 2. 数智技术如何重构城市规划与空间治理的边界?

新一代人工智能、空间大数据与数字孪生等技术为城市规划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边界。传统规划依赖静态数据与经验判断,难以应对城市系统的动态性与高度耦合性。如今,计算城市科学(computational urban science)的兴起,使我们能够实时感知城市运行、动态模拟人口流动、土地利用、交通与资源配置等复杂过程。大数据驱动的模式算法与多主体仿真为规划提供前瞻性 with 自适应能力。

以数字孪生为例,政策与方案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迭代试验,为现实决策提供科学回馈。数智平台还突破了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促成跨部门、多主体的协同联动。社会参与机制、公众反馈渠道、多元利益协调也通过智能系统得以高效整合。因此,城市规划不再只是蓝图绘制者,更是“建模—模拟—调优—治理”一体化系统的设计者。人机协作的“共治机制”逐渐成型,推动城市治理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型、预测型与反馈型。

#### 3. 规划学科的新使命:如何回应社会转型与技术革命的双

重挑战?

随着中国城市进入“存量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传统的增量规划逻辑逐步失效。地区发展不均、空间碎片化、人口老龄化、生态脆弱性与社会治理多元诉求的叠加对规划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规划师不再只是“空间的设计者”,而必须转型为“系统的集成者”“数据的解码者”“社会协同的组织者”。

这意味着:一方面,规划人才需具备数据建模、空间模拟、系统分析等新型技术素养;另一方面,规划人才也要深化对社会结构、文化机制与公众行为的理解与引导。学科建设亦应跨界融合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社会学与生态学,推动规划理论的本土建构与国际对话共进。归根结底,规划学的根本使命是塑造有序、公正与富有韧性的空间秩序,在数智赋能中守住“人”的中心,为社会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城市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现代化进程,而城市正处于这一空间转型与治理跃迁的最前沿。从空间扩张走向系统重塑,从经验治理迈向数智协同,城市不再是增长的附属容器,而是国家战略的实验场与公共价值的承载体。

计算城市科学与数智治理的崛起,不仅丰富了规划技术工具,更促使城市规划范式从“静态蓝图”走向“动态协同”,从“空间设计”走向“制度建构”。这一跃迁使技术与制度、公众与数据、政策与空间之间形成系统耦合,推动城市治理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弹性与开放的阶段。

面向未来,唯有持续深化人机协同、推动知识体系与实践逻辑的革新,才能真正让城市规划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复杂性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城市空间的战略跃迁,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新,更是一种制度再造与公共价值重构的过程,关乎国家现代化的空间承载力与社会公平的实现路径。希望我们能以系统思维应对复杂挑战,以技术能力回应公共诉求,以空间治理承载国家愿景,让城市规划真正成为托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座。

修回:2025-06